

把吐鲁番搬来武大!

149件出土文物讲述丝绸之路往事

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里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故事?日前,“交河一万里——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特展”在武汉大学开展,吐鲁番出土的149件(套)珍贵文物再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以及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的繁华印记。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走进展厅,一幅大型“汉代陆上丝绸之路路线图”展现了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阳关,丝绸之路开始分支,经哈密可以到达吐鲁番。之后,通向亚洲腹地,并连接西亚、南亚和遥远的地中海各国。

展柜中,两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汉代彩陶展示了吐鲁番早期先民的审美追求。彩陶上绘制着三角、折线、菱形等精美图案,这些图案和吐鲁番出土的毛织衣物残片上的图案非常类似。洋海人为什么要在陶器上绘制此类图案呢?经研究发现,原来洋海人发现毛织衣物不易破碎,就将衣物的图案画在陶器上,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洋海墓地出土的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中原与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群,经考古研究,属于车师文化的族群,是吐鲁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该族群同时有中原、中亚、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说明早



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存在文化交流交融。

秦汉时期,车师人以交河为都城建立了车师王国。自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开始进入并治理吐鲁番地区,历经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4个阶段。九世纪中叶,回鹘迁徙至此,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先后臣属于唐、宋、元等中央王朝。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吐鲁番每一处遗迹都见证着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文书文物再现丝路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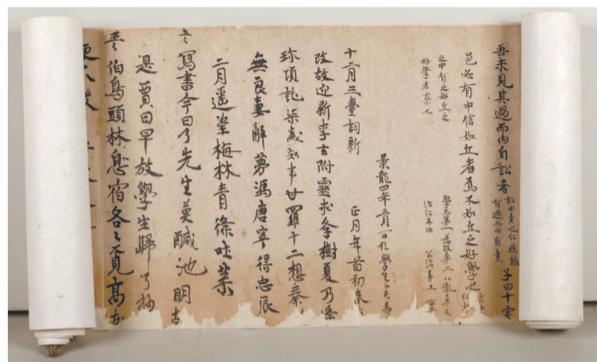
唐代的“任命书”长啥样?国家一级文物《郭毡丑告身》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任命书”的模样。这件文书于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其上存墨书35行,内容是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官方颁布勋告郭毡丑战功的抄本,记录了主人公在沙泽阵、缙岭阵、东熊陆岭阵3场战役中的功勋。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这件告身揭示

了七世纪中叶的西域形势,是研究与复原同类型告身文书的重要史料。”陈爱峰说。

盛唐时期,文人出塞成为一种现象。展厅中一件《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就留下了诗人岑参在边塞的足迹。文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506号墓,记载了公元754年至755年,每天往来于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二州驿站和长行坊之间的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况。文卷中提到的“岑判官”,经研究分析就是岑参本人,而其中文书残片当为岑参的马料账单。

唐代的小学生“家庭作业”是什么内容?一件名为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小学生的日常。

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文书,总长5.38米,宽0.27米,抄写人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名叫卜天寿。可以看出,文中虽有一些错字,但字体很工整。有意思的是,卜天寿抄写完《论语·郑玄注》后,还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诗,催促让先生早点放学,“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论语·郑玄注》。

观众参观出土的陶器文物。

张畅 摄

卜天寿为什么抄写《论语》写本?是谁让一个12岁的孩子抄写这么多儒家经典?陈爱峰说,经研究发现,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样的,除了政府主办的官学之外,由寺院资助的私学也在吐鲁番兴办起来,卜天寿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这所私塾设在一个叫开觉寺的寺院里,是由寺院资助附近的孩子免费就读。

根据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吐鲁番的寺院经济发达,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园,并靠出租葡萄园获取经济收益。于是,一些寺院就出资开办私塾,也叫“义学”,就是当时义务开办的学校。

“此次特展展出的149件(套)文物文书,是迄今为止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最为全面、最高规格、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吐鲁番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勇说,“吐鲁番文书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它记录古代多维度史实,见证了古代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据新疆日报

文化中国行

民族交融的“史书”藏于华服

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近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展厅内的观众络绎不绝。柯尔克孜族绣花女袍、赫哲族鱼皮衣、藏族银腰饰……展览汇聚了多个民族的特色服饰,款式多样、材质纷繁、工艺精湛、色彩绚丽,堪称一场服饰文化盛宴。

置身厅内,200余件服饰述说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中华服饰文化绵延不断的生命力。步入“多元一体”民族服饰展厅,一件“满族缙丝红地八团花卉纹吉服袍”引人注目。

这件吉服袍为清代满族贵族女性在仪礼场合穿用,其基本形制为圆领、右衽、阔袖,衣身两开裾。胸背、两肩及前后下摆处缙织八团暗八仙花卉纹,底摆缙织海水江崖纹,整体装饰纹样繁复华丽、寓意吉祥美满。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田辉介绍,中国传统袍服造型简练、款式大方,自先秦时期已有使用,汉代以后服用更加广泛。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等都有穿着长袍长衫的习俗。

“这件吉服袍是清代满汉服饰文化



满族缙丝红地八团花卉纹吉服袍。



经过修复的“元代龙凤纹织金锦辫线袍”。

受访者供图

交融的重要见证:满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为适应骑射之需,其传统袍服多为“紧身窄袖”样式,清代中后期,受到汉族女装宽身博袖造型影响,满族宫廷女性吉服袍的袖筒及马蹄袖口变得更加肥阔。”田辉说。

在“衣冠流传”展厅内,一件经过修复的“元代龙凤纹织金锦辫线袍”同样留存文化融合的痕迹。

田辉介绍,辫线袍是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社会流行的一种男袍,因腰部

钉缝的数百条辫线而得名。此件元代辫线袍采用“交领右衽”设计,袍袖细长且袖口紧窄,腰部合体且缝有辫线细褶,并有暗摆式后开衩,在结构上具备上紧下松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游牧民族骑射服装的功能性特质。

“辫线袍的龙、凤、牡丹等衣身纹样中融入传统吉祥文化的主题元素,体现了中华传统服饰的多元发展。”田辉说。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发展持续而广

泛,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彼此不断兼容并蓄,共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田辉说。

谈及传统服饰保护,他介绍,民族服饰博物馆利用科技手段,对一些珍贵的服饰、纺织品进行了修复;还针对一些文物级服饰展开服装形制、织物材质、装饰纹样、染色技艺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这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服饰文化的科学传播。

据中新社